

（一）张保皋和赤山法华院

一、少年时期的张保皋及其寻祖归宗

首先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张保皋的出生年代。关于张保皋的出生年代有两种说法：一是韩国《张氏渊源宝鉴》中记载，张保皋出生于新罗哀庄王二年（801），这种说法就和杜牧在《樊川文集》中所记载的在819年平定李师道叛乱中提升为武宁军小将，在30岁左右就不相一致；二是张保皋纪念塔竖立的纪念碑碑文记载是出生在790年，虽然在年代后面打个问号，但我们认为这个年代是可靠的，它和杜牧在《樊川文集》中记载的年代是相一致的。因此我们采取第二种说法，张保皋出生在790年。

张保皋出生地是在新罗（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长佐里。该村在张保皋出生时叫“张佐里”，距海仅180米。新罗文圣王时，说张保皋谋反遭诛，居民被迁移，无人居住。高丽时候，正言李颖解甲归田，他的叔父慧日法师来此结拜居住。壬辰倭乱时，仁同张氏、晋州苏氏、昌原黄氏搬来居住。之后，玄风郑氏、南平文氏等也搬来居住。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时期，改名为“长佐里”。

张保皋的祖籍是中国，根据《张氏渊源宝鉴》记载，张保皋的祖籍是中国浙江省苏州府嘉兴。又根据张保皋823年在赤山浦（石岛湾）建立赤山法华院推测：可能后来又迁移到赤山浦，因为当时赤山浦和浙东地区都是新罗人集中居住的区域，对新罗海上交通都很方便。张保皋的父亲叫张百翼，曾多次东到新罗，定居莞岛，过着渔民生活，“是归化新罗的中国人”。^①据传说，张保皋的祖父是今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古楼村人，因家贫困，被今靖海镇张

家竹村招去当了养老女婿，生了儿子张百翼，为了谋生，多次去了新罗，定居莞岛张佐里。

为什么说张保皋祖籍在赤山浦？因为石岛镇张家村张世廉先生保存有张氏家族族谱。韩国中央大学校长金成勋等编著的《张保皋》一书中，曾转载了该族谱的图册。图册的上方有一轮红日冉冉上升，红日的下方是海水的波纹，波纹中有“思泳”二字。韩国学者认为红日是从东方升起，新罗曾称为“大东”国家，也就是说是从“大东”升起的，思泳就是思念从“大东”来的张泳。张泳是张保皋时常驻赤山浦，勾当新罗所“押衙”，又称为“大使”。确认了张世廉先生保存的张氏家族族谱就是张保皋的家族族谱。

张家村张氏家族是由靖海卫（今靖海镇）迁移来的。张世廉先生保存的这份家谱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家谱。这部家谱记载的第二代辈份所用的字是“皋”字，和张保皋的“皋”可作通假处理，在古文中是通用的。按中国习俗，30年为一代，也即30年为一辈份。又按十二属相，12代，即12辈份为一轮回。从张保皋（790—864年）生卒年代的“皋”字到明代万历年间“皋”字辈，恰好两个轮回，大约720年左右。张家村张氏家族族谱延续到清代，由于战乱及历史变迁，曾经间断过一段时期，后也是由靖海卫迁移到东王门村，清代年间贡生张国琪先生续家谱，理顺辈份所使用的字，即从康熙年间的儒、曰、和、学、连、云、国、保等八个字。其中“保”字辈份的生卒年代，约自清光绪年（1875—1908年）到1941年左右，恰好又一个轮回。也就是说从张保皋的“皋”字辈到明代万历年间的“皋”字辈，以及到1941年左右的“保”字辈，共约1080年左右，恰好是三个轮回。

由上可见，张保皋的辈份和张家村张氏家族辈份以及和东王

门张氏家族的辈份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确定张保皋的祖籍就在石岛湾一带。张家村传至今天的“世”字辈份，和韩国张氏大宗会所凡的“世”字辈份也是一致的，也可证明中国山东省荣成市右岛镇张家村张氏家族和韩国张氏大宗会是同一祖先，同一宗族，可进一步证明张保皋的祖籍就在石岛湾。

张保皋出生“侧微”家庭贫穷，本无名，被称为“海岛”人。入唐后才有名，有四种叫法：韩国记载将其称为“弓巴”、“弓巴”和“张保皋”。中国也称“张保皋”。据史书记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赐姓张，“弓正”、“弓矢”与“弓福”、“弓巴”音相近，可证明张保皋确实是中国张氏后代；日本则称“张宝高”。关于张保皋“保皋”两个字与韩国语“福”字，韩国语发音念成“饱个”的发音相似而借来的谐音；另一种解释是“保皋”的意思是指“保护白衣东夷民族”（皋同镐），而日本所记载的“张宝高”则有赞美，拨高的意思。

张保皋少年时期就喜欢舞枪弄棍，他的家乡全罗南道莞岛的海岛的人，多善水性，喜欢游泳，水中扎猛子。那里的人从少年时期起，肌肉发达，力大无比。在《新增东国与地览胜》“康津县·古迹”篇中的“射岬”一节说：“过去岛上生活一个人，英勇无比，射箭60里远，弦断见血。”现在石砮上还有箭矢的痕迹，因此该地就叫“射岬”。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就是张保皋。那里出现过许多倍受国内外尊重的肝胆侠义，心胸广博的人士。曾和张保皋一生在内外同甘共苦的同乡好友郑年，也是武艺高强，据说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下50里，而不换口气，可见其水性之好，举世无双。

张保皋自小生长在海岛，和大海打交道，养成粗犷豪放、包容性很强的性格。

九世纪初 新罗朝政松弛 徭役、赋税加重 民不聊生 社会治安恶化，窃贼纷起，怨声载道，人民不断起来反抗，特别到宁德王(809—826年)社会治安更趋恶化。据《三国史记》卷10载 宁德王6年，西部地区暴雨连绵，洪水成灾，饥民盗贼蜂起，很多人为了逃避灾荒，在宁德王8年一年中，就有170多人，渡海逃到中国求食。宁德王9年 饿死人很多 同书记载 宁德王7年开始 接连不断引发草民起义。宁德王14年，熊川州都督金宁昌对起义的草民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这样饥民为寻求生路，纷纷外逃，逃向中国。

张保皋就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和他的好朋友郑年，由黄海横断航线渡海，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来到中国山东省山东半岛赤山浦(石岛湾)寻祖归宗。

注：

韩国文化部、海运舰湾厅、全罗南道、韩国文化艺术振兴院合著《张保皋》。

《三国遗事》(卷二 神武王、闫长、巴弓)

二、张保皋入唐背景

1、唐和新罗的友好关系

中国和韩半岛本属同一中国板块，根据韩美地质学者近年研究，韩半岛的以临津江为分界线，以北为北中国板块，以南为南中国板块，大约在两亿三千万年以前，北中国大陆和冈瓦纳一部分南中国大陆相撞而形成了今韩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文登县志载 尧时青州越海而有辽东、乐浪、三韩之地。《后汉书·东夷传》曰，宅是山禺夷，曰乃谷，指今朝鲜（韩半岛，下略，即朝鲜就是指韩半岛）言，禹贡锥指。据后汉书以嵎夷为朝鲜地，盖朝鲜古属青州。古中国有九夷 孔子曰：“欲之九夷”，嵎夷九夷之一也！

周灭商 纣王叔箕子“去之朝鲜”建箕子国 颁布成文法典，《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使“其民终不相盗 无门户之闭”。

秦王朝时期以及秦末汉初，中国战乱频仍，公元前 195 年左右，燕人卫满率千余人亡命朝鲜，驱逐朝鲜王箕准，自立为王。公元前 108 年，汉派兵灭了卫氏政权，在韩半岛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直属汉朝的统治。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唐应新罗的请求，派大将苏定芳率十万大军由成山，即山东半岛东端，包括石岛湾出海打败百济和高句丽，以及帮助百济的日本军，焚其船舰四百艘，设置安东都护府，任命薛仁贵为都护，镇守平壤，帮助新罗统一了韩半岛。自此以后，两国的关系就更为友好和密切。据史籍记载：从 703——897 的 195 年间，新罗曾向唐王朝派遣使节团共 89 次 唐王朝向新罗

遣使共 18 次，说明当时双方的交往非常频繁。另外，新罗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来学习文化和佛教经典。837 年，新罗在中国学习的留学生竟达 216 人。新罗留学生中，涌现出如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杰出人物，他们为中国文化在韩半岛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罗还参照唐朝的制度，改革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构。788 年，在“读书三品出身法”规定：“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文，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籍，超擢用之。”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以学习儒学经典和汉学来选拔人才，但骨品制、花郎徒和弓箭等方法的选拔人才的旧制度还是存在着。

由于唐和新罗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和密切，新罗人来中国谋生、做生意、出苦力的也很多。他们有的就长期居住在中国，刘希为先生在《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一文中记述说：“仅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看，新罗人留居唐境，大概有七道（关内、河南、河北、淮南、剑南、山南、江南道），十九个州府（归义、徐、泗、海、登、密、青、淄、莱、兖、金、江、台、楚、扬、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其中主要密集在京都长安、河北道和河南道、淮南道和沿海诸州、县、村、乡。尤其山东半岛、江淮地区的傍海地区和运河两岸，是新罗侨民聚居地。”^①也就是说新罗的侨民主要聚居在山东半岛、中国东南沿海直到福建沿海，京杭大运河沿岸直到幽州（现在的北京）；长江沿岸以及汉水沿岸直到关内，包括长安在内。

关于唐和新罗的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根据《新唐书·新罗传》和《唐会要·新罗条》的记述：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新罗遣

使朝贡唐朝开始，从此贡使不绝于道，史称，每年贡使来朝，或一岁再至。贡使贸易“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仅据开元十二年（724）一次贡使贸易，新罗就“献果下马二匹、牛黄、人参、头发朝霞细、鱼牙、纳细、鏐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唐玄宗赐给新罗王兴光“白鹦鹉雌雄各一、及紫罗绣袍、金银细器物、瑞文锈绯罗、五色罗、绛绫共三百余段”。可见新罗贡使贸易数额，为其他各国之首。到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以后，因唐朝日趋衰败，新罗内部也不断斗争，“朝贡不复至”。贡使贸易关系中断。但两国民间贸易往来仍很频繁。（有另篇专述）

韩古时候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在公元前5——2世纪，中国的汉字便传到韩，当时韩半岛上已形成了古朝鲜和辰国，不仅接触了汉字，而且开始使用了汉字。到高勾丽建国初期，即公元前后，便广泛地使用了汉字，并且利用汉字撰写本国的史籍。有人用汉字记下高勾丽史事一百卷，名曰《留记》。在我国集安县高勾丽古墓中曾出土了大量的砖瓦，其中有些砖上刻有“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丘”、“千秋万岁永固”、“保乾坤相毕”等字样。在集安县发现的“好太王碑”是建于高勾丽将其政治中心迁到韩半岛前不久的414年，碑的四面环刻汉字碑文，共有1775个字。随着汉字的传播，汉文学在高勾丽也有了发展，现存的高勾丽人的汉诗，在形式上与当时中国的古诗极为相似。三国中的百济也很早接触了汉字。346——375年，百济博士高兴以汉文撰写百济国史《书记》表明在此以前百济输入的汉字、汉文学已有很常时间了。545年，新罗的居柴夫等人也以汉文撰写新罗国史，新罗还出现了许多擅长汉文文章的学子文人，如帝文、守真、良图、风训、薛聪、强首等。671年，新罗王文武王金法敏《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史学界一

般都认为出自强首的手笔。这篇答书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是韩古代汉文文章的典范。

汉文在韩三国时期已广泛使用，七世纪中后期，强首、薛聪等人在总结韩人在长期使用汉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用汉字的音或意，标志韩语的方法——“吏读”。吏读的创制，带来能用韩语解释大量中国书的可能性，使韩对中国文化典籍和汉文的学习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吏读”也是后代韩“国文”的先声，从此韩人有了表示和记述自己的语言工具，为1443年创制“训民正音”的韩现行的拼音文字奠定了基础。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孔子儒家学说就开始传入韩半岛。从那时起，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儒家学说在韩逐渐传播、扎根，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和在中国一样成为民族文化、民族思想的主体，对韩民族文化、民族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中国汉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的地位，对韩治理国家起到指导思想的作用。韩半岛三国鼎立时期，儒家学说对韩有了进一步的传播，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设立了专门的国家教育机构，传授五经三史等儒家经典和史书，以儒家学说思想教育贵族子弟，同时向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邀请中国学者去韩讲学。当时，不仅贵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民间子弟也有学习儒家思想，例如《三国史记》记载新罗著名学者强首早年就师学习儒学的事例：“及壮，自知读书，通晓义理。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以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典礼》、《尔雅》、《文选》。所间蚕浅近，而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之杰。”^②

由于政府大力的提倡，儒学在韩三国都有比较广泛的传播，学习儒家经典成了社会风气，儒家思想也产生了普遍的社会影响。新罗统一韩半岛后，需要儒学作为统一统治的思想力量，而继续提倡儒学儒家思想，兴办儒学教育。682年，新罗仿照唐朝制度设立国学，747年，改国学为大学监，设置各科博士及助教等教学人员，入学者为15岁到35岁的贵族子弟，修业年限9年。太学供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所设课程也都是儒家经典，如《左氏春秋》、《尚书》、《周易》、《礼记》、《毛诗》、《论语》、《孝经》、《文选》等。新罗王朝有几代国王亲临国学听讲，以表对儒学的提倡和对儒学教育的重视。除中央设置国学外，地方也设有学校，招收平民子弟学习儒学经典。新罗王朝还向唐朝扩大派遣留学生的人数，一时留学中国风气颇盛，其中有不少人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科考及第，成为著名的儒学者。另一方面，唐政府也主动向新罗输出和传播儒学，注意挑选精通儒学的人充任和出任新罗的使者，责成他们到新罗后一定不要忘记阐扬儒家经典。如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派邢铸出使新罗，临行前“上谓涛曰：‘新罗号为君子国，颇知书礼，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颇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③。这些著名儒教学者和使者频繁交往，对于儒学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桥梁作用。

中国佛教大约在韩三国时期传入韩半岛的，372年，中国前秦王苻坚遣使送名僧顺道和佛像；374年，又有名僧阿道从东晋前往高句丽；375年高句丽建立了肖门寺和伊佛兰寺，顺道和阿道分别住在这两所寺院里，宣讲佛经，这是佛教在高句丽也是在韩正式传入的开始。392年，高句丽国王颁布崇佛法令，要求人民“崇信佛教求福”。393年，又在平壤新建九所寺院，积极鼓励崇信佛教。

几乎与高句丽同时，佛教也传到了百济。384年胡僧摩罗兰陀从东晋到百济，次年百济“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是百济信奉佛教的开始。从此以后，佛教在百济逐渐兴起，成为“僧尼寺塔甚多”的国家。541年百济遣使梁朝，请求“涅槃”（佛经），说明当时百济已开始对佛教经义的研究。

在三国中新罗传入的佛教稍晚些。5世纪中期后，高句丽僧墨胡子和阿导先后到新罗——善郡（今善山）宣扬佛法，渐有人信奉。528年，国家正式承认佛教，并予以特别保护和鼓励。使佛教在新罗逐渐兴盛起来，甚至有几位国王也剃发披起僧衣，自取法号。国家设置寺典、僧房典之类的负责寺院行政的特殊机构，高僧辈出，大寺院相继建立。在首都庆州附近，建立无数的寺院和塔，出现了许多佛像和雕塑。在庆州吐含山西南麓有座佛国寺，据《三国遗事》记载，是新罗宰相金大城为其父母于公元540年建造的。佛国寺的含义是“佛的国家”，从佛国寺发现的经卷可以证明，佛国寺释迦塔内二层舍利洞内有一方形舍利函，函内有用丝绢包装的一卷雕版楮纸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卷佛经经文是唐朝楷体汉字，并有武则天称帝时使用的“证、授、地、初”四个武周制字和10世纪以前中国民间通用的俗体字或异体字。经中国学者考证，这卷佛经是在唐朝初期的佛教和造纸基地洛阳印制，传到新罗后，放进了公元释迦塔内的。^④新罗统一韩半岛时，曾用所谓佛的“恩德”给自己统一事业披上了佛教神秘的外衣。统一后新罗王朝更是大力推崇佛教，以致有“佛教王朝”之称。

随着佛教在新罗的兴盛，来中国留学的新罗僧日益增多。据《朝鲜佛教史》初步统计，从6世纪前半期新罗正式信奉佛教以来，一直到10世纪初的380多年间，入唐求法的新罗高僧就有64

人，此外还有一些新罗僧人渡海到唐朝长期居住，如在山东半岛赤山浦（石岛湾）赤山村由新罗人张保皋建立的赤山法华院，常住新罗僧人就有 30 多名。长安有新罗寺院，寺院的住持皆为新罗僧。台湾严耕望先生考证寺为唐代旧寺名，相沿而至清，因为新罗僧居留而得名。^⑤浙江天台县寺院里有新罗僧，唐代诗人《张籍赠海东新罗僧》诗中有“天台几处居”句。另《全唐诗》卷七六三有《杨葵送日东新罗僧游天台诗》。这些“留学僧”和“常住僧”对于中国佛教在韩半岛的传播以及中韩两国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传入韩半岛的中国佛教宗派有律宗、涅槃宗、华严宗、法性系、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禅宗在韩分立于九山（迦智、实相、桐里、阁堀、凤林、狮子、圣住、曦阳、须弥）现代人把前五宗及禅宗称之为“五教九山”。五教九山开创时期，除九山中的须弥山在高丽王朝初年外，其他都在新罗王朝前期。

在中国佛教东传韩半岛过程中，新罗有两位僧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位是义湘，一位是元晓。义湘在 20 岁时投京师皇福寺出家，650 年来唐投终南山智严门下学习《华严经》曾与中国僧人法藏同学。回国后奉旨于太伯山（今庆尚北道）建浮石寺传华严宗教义，成为新罗华严宗始祖，门下有悟真等十大弟子，宗势在新罗大为兴盛。法藏撰《华严经探玄记》送副本于义湘“湘乃令十刹传教”，这十刹中有原州毗摩罗寺、伽耶海印寺、毗瑟玉泉寺、南岳华严寺等。由于义湘在韩传播佛教影响很大，所以，后来的高丽王朝曾赠谥他为“圆教国师”。

当年同义湘结伴入唐而行的元晓，也意欲到中国学习佛法，但中途在韩半岛西侧海上，元晓被敌国高勾丽所拘留，逃出高勾丽后继续启程赴唐，据说在途中遇到大雨，便躲进道旁一个土龛

中避雨，第二天早晨发觉自己竟躺在古坟骸骨旁，觉悟到一切由心之生灭“三界唯心 万法唯识。心外无法 胡用别求。”于是放弃赴唐留学的打算，返回新罗，住留芬皇寺，深入钻研玄奘新译佛经绪论，在新罗倡导法性宗，为调和统一各宗派的对立斗争，撰著了《十门和诤论》。因此元晓的法性宗与唐朝的法性宗略有不同，又称“海东宗”。后元晓破戒 自称卜性居士 皈依净土宗 言行狂悖，周游各地，致力于净土宗的传播，使其得以在下层社会广为弘布。元晓还应国王之请为《金刚三昧经》作疏 疏成开讲“王臣道俗 云拥法堂”“称扬弹指 声沸于空”为新罗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中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三国史记》，引自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第6页。

《旧唐书东夷列传》。

郑保勤：《庆州——韩国古老文明的摇篮》，1998年5月24——27日《参考消息》。

严耕望：《新罗留学生和僧侣》。

2.石岛湾的地理位置及其海上的交通和贸易

石岛湾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滨临黄海，东经 122° 29′，北纬 36°53′三面环海，一面依山，背靠著名的赤山(石岛山)槎山和朝阳山(干将山)山系。北和辽东半岛相对，如同两扇大门，包围着渤海，守护着京津塘地区。东和韩半岛、日本列岛遥相对。和韩国仁川仅相距 94 海里，帆船一天一宿的航程。南联东海，与五大洋、七大洲相联接。海岸线长 22 公里，比较平缓，前有镆铳岛作为屏障，海水深度 8 - 12 米，风平浪静，气候宜人，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 11.4℃，夏季平均 20.8℃，冬季平均 -0.4℃。

石岛湾早在远古时期就有对外海上交通。在石岛镇车脚河村的西山、今赤山法华院后面，康家坟附近的石砌上发现有船上使用的铜锚，两个趾陷在石砌缝里，一个趾露在外面，约有 60 厘米长，尖端约有 15 厘米粗，中心部位还有两个铜环。据考证，这是青铜器时代的铜锚，也就是说在铜器时代，即夏、商、周时，石岛湾就有海上航船。而且在这铜锚附近还发现蛤壳，那么这铜锚、蛤壳是怎么跑到山上去了呢？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一卷，刊载张淑臻、林玉海《胶州湾港口与元明时期的胶莱漕运业》文章中论证说：“元明以降，由于云溪河、胶莱河、大沽河等河流的泥沙淤塞，海水南徙 20 余里。”我们也可断定石岛湾经几千年山水冲刷和流逝，夹带沙石的淤塞，海岸不断向外推移，原沉没海底的铜锚就逐渐露出海面，长年风化就逐渐陷在石砌里，海水里的蛤壳也就这样跑到山了。另据海洋历史研究所论证：石岛位于欧亚大陆和太平洋地块挤压地带，地质逐渐隆起，也可说明铜锚、蛤壳为什么会跑到山上去了。

商代开始有铸造铜器的铜范。铸造时，根据器物的模型制成

陶质的铸范，然后注入青铜熔液于陶范中，待溶液冷却，撤去陶范，便得到铸成的铜器。铜器铸成后，一般要经过一道修饰，使之更加美观。从这个铜锚的光滑面来看，它是铸范铸造而成的。可以断定 这铜锚是中国商代的产物。《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5 期刊载王永波先生《胶东半岛上发现的古代独木舟》一篇文章介绍说：“1983 年在荣成县毛子沟发掘出土的商周时代独木舟”。毛子沟即泊于镇松徐家，约距海岸十华里，也可证明了石岛山上的铜锚是商朝时代的。

周武王灭商，纣王叔箕子和不肯做亡国奴的殷遗民五千多人，逃到韩半岛。他们是怎样逃到韩半岛的？近年来，史学界考察美洲印第安人祖先，几乎一致肯定是亚洲人。以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为首的“开放派”认为，亚裔流亡者和探险家早在哥伦布以前，就抵达美洲 使那里的宗教、艺术、天文、建筑蓬勃发展 形成了美洲第一个文明“奥尔梅克文明”该文明对此后的“玛雅文明”“阿兹台克文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①由此 我们可以和石岛西山上发掘的铜锚一起推论，箕子和不肯做亡国奴的五千多人，是从山东半岛最东端即石岛湾逃离出海，东渡韩半岛的箕子在韩半岛建立箕子国 创建“箕子田”。据张政琅的《上古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文指出，箕子田是在今平壤、大同江流域。而大同江口正是流经石岛湾的洋流直趋之地。我们可以推测箕子和五千多人不肯做亡国奴的殷遗民，在石岛湾乘船或筏随着洋流漂泊到大同江，在那落脚 建立箕子国 创建“箕子田”。

商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交换范围也扩大了。在殷墟周围的商代古墓中普遍发现了贝。盘庚称贝玉，为“宝货”“好货”。贝壳产生于东海 当然 也包括山东半岛最东端石岛湾。以贝为货币，商

王和贵族常常以“贝”赏赐臣下。

文登县志载：“据后汉书以嵎夷为朝鲜地，盖朝鲜古属青州，与今登州之东境隔海相对。”孔子曾说：“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意思是说，我的行之仁道，在中原行不通，就乘木筏渡海而居九夷。嵎夷，九夷之一也。只有去隅夷，去韩半岛，才需要渡海。可见在这以前是有人渡海去韩半岛的，否则，就不会要渡海“欲之九夷”了。

春秋大国争霸，鲁哀公九年（486）吴王夫差准备北上争霸，进攻齐，筑邗城（江苏江都县，《太平寰宇记》称为邗沟城），邗城下掘深沟，通过射阳湖（江苏宝应县东）至末口（江苏淮安县）入淮，贯通了长江、淮河两水域。鲁哀公十年（前485）吴将军徐承率水师自海上攻齐，在黄海发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一次海战。鲁哀公十三年（482），夫差又深掘了沟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自吴都（邗城）乘船出发，一路可入海北上；一路可逾长江入淮河，又逾淮达泗、沂、济三水。黄海海战，我们可以断定就是石岛湾滨临的黄海。为什么这样说？进攻齐在黄海发生海战，肯定是齐疆界的黄海海域内。齐灭莱，地域扩大一倍，直达东海，莱就是莱子国，是山东东部一个古国，其疆西跨淄河流域，北至北海，南至今莒县、诸城、胶州域，向东一直延伸到半岛的东端。莱建不夜城（今荣成市埠柳镇不夜村），可见齐灭莱，齐的疆域已达石岛湾，滨临黄海了。成为真正拥有渔盐之利海上王国了。由江淮既可从海北上，也可以推测范蠡离越流浪江湖，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29页载：“范蠡自徐回到越国，就带着财宝、珠玉乘舟浮海逃往齐国做大人”。初隐居海边做起生意，更名鸱夷之皮，后移居陶（今山东定陶）称之为朱公。齐国海岸边，东海也，黄海之战，山东半岛最东

端，石岛湾也。可见石岛湾自春秋已有对外贸易往来了。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一个富海强国的东方大国，海上贸易已很发达了。八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了石岛湾畔历年来曾出现过大量的齐国刀币，尤其在石岛湾西岸车脚河口，曾先后两次发现齐国刀币。第一次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据目击者回忆，共出土的刀币达六拾筐之多；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在同一地方，据当事人讲述，出土的刀币，大多锈结成块，结块上的刀币排列有序，每块的数量大体相同。结块上都附着朽烂绳索的痕迹，依稀可辨，我们可以推测这块刀币都是成捆结扎起来的。币面铭文大多是“即墨止法化”。这些刀币是怎么来的呢？有的说是特意窖藏起来的。……是齐地先商们在海滨从事商贸活动所遗留下来的货币储备；又一说，根据车脚河口西山上发现的铜锚，以及根据海岸线向外推移的学说，我们认为这些刀币很可能是商贸船只遇海难沉没淤积而来的。这样可以断定，齐国海上贸易规模已经很大的了。石岛湾已是齐国对外贸易一个窗口了。

据荣成市文物馆张启明先生讲述：“《管子》所载当时齐国已经与朝鲜有着经贸往来。其《揆度》篇云：‘放朝鲜之文皮，一莛也。’其《轻重乙》篇又云：‘发朝鲜不朝，请文皮兑服而以为币乎。’文皮就是斑纹美丽的虎豹皮，是高贵的皮裘衣料。可见春秋战国时代，‘朝鲜之文皮’已经充斥齐地市场了，而且颇受齐人青睐。”

“那么，朝鲜之文皮是怎样流入齐地的呢？我们知道，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被黄海分隔在东西两岸，在当时条件下，彼此往来无非取陆路和海路两条。如果取陆路，必须经过当时的燕国（现在河北省的北部）、孤竹国（现在辽宁省西部）以及辽东一带许多部族地区，不仅道路崎岖遥远，而且非常艰难危险。如果取海路，就

十分便捷。按现在航海计程，从石岛港到仁川还不足 94 海里。据公元九世纪日本圆仁法师入唐回国时在这段海程记录，航行时间不到 24 小时。当然，公元前的航海技术要原始得多，可是这一海程的地理优势，应该是亘古不变的。实际上先秦人对朝鲜地望的认识，已经反映出海路在与朝鲜交往中的重要性。代表先秦地理观的《山海经·海内经》云：‘东海之内 北海之隅有名曰朝鲜’。这表明当时人们把朝鲜视为海中之国，或者是个被隔在大海彼岸的国度。所以说齐人与朝鲜间贸易往来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深受齐人所喜爱的‘朝鲜之文皮’是舶来品。”

“当时‘文皮’商是从哪里向齐地输入‘文皮’的呢 也就是过岸的问题。在汉代人传下来的古老词书《尔雅》里就给我们揭示了一处先秦齐地东方与‘文皮’有关的地点。《尔雅·释地》云：‘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注疏家们一般都认为这‘东北’应是‘东方’之讹 即斥山在东方。这里的‘文皮’仍同《管子》‘朝鲜之文皮’，只是地点变了。《尔雅》把来自朝鲜的名贵皮货说成来自斥山 而且将其夸誉为‘东方之美者’。..

“.....到本世纪 50 年代初，张政琅先生在《上古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文中，才将这一问题作了科学的阐明。张先生指出：‘斥山是一个很小的山’，‘不出虎豹皮’ 他所以特别出名的缘故只因为是一个海口。‘在春秋战国时代，朝鲜和齐国有着密切的海上交通和商业往来。’因此这‘斥山之文皮’就是‘朝鲜之文皮’。”

“由此看来 在先秦时期，‘朝鲜之文皮’是由石岛湾海口输入齐国的。所以我们可以毫不虚夸地说：远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石岛湾就是中国大陆对外通商贸易的重要口岸”